

改 变 那 个 世 纪 的 人 和 事



亲

历 一 九 五 七

QINLI YIJIUWUQI

徐铸成

开国第一文化冤案 唐文权

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 于光远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纪实 李 邈

红卫兵出世纪 秦晓鹰

十月风雪 范 硕

湖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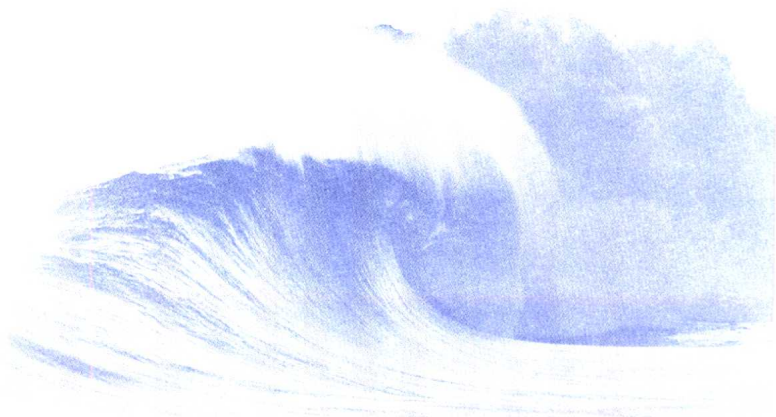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

亲历一九五七

QINLI YIJIUWUQI

徐铸成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著

出版
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140 千字
版次：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数：1—8 000
书号：ISBN 7—216—03640—9/K·371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8
插页：3
印次：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6.80 元

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亲历

一九五七

徐铸成

1——42



开国第一

文化冤案

唐文权

43——64

《文汇报》的创始人、原总编辑徐铸成将自己在1956年——1957年的亲身经历不加修饰地予以叙述，文中只讲事实经过，不加评议，读者却能从中了解“阳谋”的前因后果，看到历史的真相。

徐铸成、傅雷、浦熙修等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当时是衷心拥护共产党，由衷尊敬毛泽东的，可是不知是领导人的误解还是不放心，演绎出一场历史悲剧。

张春桥、姚文元抓住人家一句话不放，大做文章。他们整人起家的历史在那时已初露端倪。

历史的教训给我们今天有深刻的启发……

1951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其狠揭猛批，上纲上线，开建国后历次思想运动之先河，有资格溢为“开国第一文化冤案”。

陶行知是电影《武训传》的直接有力催生者，批判武训传的目的是批判陶行知和其弟子们。

在评论武训和陶行知是是非非的公案之内，还包含着另一桩江青和陶行知恩恩怨怨的公案。

陶行知在三十年代有援助江青之恩，但也有开罪江青之怨……

建国初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的江青，踩着已经死去的陶行知及在世的其弟子们，以文化教育为阶梯，向权力中心爬去……

为天安门“四五”事件平反，许多人经历了从1976年到1978年两年的鲜为人知的曲折努力。

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等三人冒着风险在没有请示中央的情况下加标题发头版头条：“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全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他们的行动取得了成功。

经济学家于光远亲身经历了争取平反的全过程，并参与了曾涛等三人的策划，他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把真相告诉我们……



天 安门事件 平反真相

于光远

65 — 78

王洪文率十万造反派血洗了在康平路请愿的“赤卫”队员。

张春桥要回上海摘桃子，他以什么身份回上海，颇费了一番心机。

张春桥和陈丕显（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再次见面，这两位政治对手的心境和态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张春桥已经看清陈丕显必然倒台的命运，故意摆足了架势。

张春桥三次夺权流产，红卫兵要炮打张春桥，张春桥调军队对付学生。王洪文找到了机会效忠张春桥、姚文元，以此排斥其他造反派夺取政权。夺权的胜利实际上是他们失败的开始。



一 九六七年 一月上海纪实

李逊

79 — 158

红卫兵 出世记

秦晓鹰

159

206



当年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始作俑者三十年后坐在经理办公室里回忆往事：导火索是从清华附中高中各预科班改选班委会开始的……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谆谆教导，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台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警句，撩拨得那伙十六、七岁的年轻人热血沸腾，渴望搏击与宣泄。红卫兵在石破天惊中“金猴出世”！

当年学校大字报、小字报上的笔名五花八门的，惟有张承志的笔名与众不同，用的是“红卫兵”（这个张承志现在已是大名鼎鼎的大作家了）。后来全校造反学生们的大字报都用了这个笔名。红卫兵就这样风风火火地闯入中国政坛。

红卫兵像脱缰的野马狂奔乱闯，最后竟“炮轰江青、火烧谢富治”了。

本文中的“我”和张承志等红卫兵被抓了，康生训导“浪子回头金不换”，江青嗲声嗲气地说：“今天晚上是回学习班（就是监狱）休息呢，还是回家？……”

1976年10月,这是一个剑拔弩张的日子。“四人帮”举行武装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张春桥的杀人纲领即将实施。姚文元说:“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王洪文叫嚷:“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捉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江青穿起黑“龙袍”,准备“登基”。

玉泉山上九号楼,叶帅正在读书吟诗,沉静如常。但他笔下写着“眼前近似无聊赖”的诗句,并不能遮掩他“心潮逐浪高”。他以百倍的警惕,留意山下的动静。

“四人帮”向华国锋“逼宫”。叶帅来到华府策划战略部署。

于无声处闻惊雷,一场挽救中国命运的战斗打响了。



十月风雷

范硕

207 ——— 250



亲历一九五七

■ 徐铸成

前几年,我曾拜读一本伟大的著作,其中,有一篇谈到“阳谋”,涉及到我和当时的《文汇报》,当然,由此开始,还使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陷于罗网,成为“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的前奏。

事隔三十年,现在,早已雨过天晴,风和日丽,一切从实事求是出发,我应该把三十年前亲历的过程,不加修饰地加以叙述,希望能引出教训,让



徐铸成 1945 年从重庆返回上海筹备大公报复刊,在上海中山公园留影。

亲 历 一 九 五 七

后人评议。

为了使读者了解“阳谋”的前因后果,我想从 1956 年讲起,按时间的程序,根据记忆,尽可能详细而扼要地将我亲身所受一一记录于下。

1956 年 5 月,《文汇报》“自动”宣布停刊,职工除一部分肃反对象(其中有党员)留沪继续检查外,其余都迁往北京,参加《教师报》。我被任为总编辑。

《文汇报》所以停刊,原因有二:

一、当时上海的第一书记(有名的“一言堂”)认为上海报纸太多,不便于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根据之一:刚调来的一位党员副总编曾对人说:“我到文汇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二、教育部正拟摹仿苏联,创刊《教师报》,乃派人和我们商定,吸收我们全部人员。《教师报》创刊后,我的心情是平静的,以为不论从事业的前途,还是从个人的前途看,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必然的结果。加上当时教育部负责联系和帮助《教师报》的副部长柳湜(后也“扩大”成为“右派”),

叶圣陶遇事坦率好商量,和我相处得很好。举例言之,上面提到的原《文汇报》副总编某同志,曾把自己写的一篇文章,送柳湜副部长审阅,立即被批驳回来:“《教师报》的稿件,应由徐总编辑审决,除非徐铸成同志认为应由部长审阅的稿件,并经他签过字的,我一律不看,特退还。”

那年夏天,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曾去前门饭店看一位香港来的政协委员,在楼梯口巧遇《人民日报》的邓拓同志,他热情问我:“铸成同志,你是哪一天抵京的?”

徐 铸 成 著

我答:“我已搬到北京了。”

邓拓同志听了“哦”了一声说:“我是听到你在主持《教师报》了。”接着他说:“我认为《文汇报》停下来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别的报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当晚,我回家反复沉思,《文汇报》究竟有哪些特点,值得邓拓同志怀念呢?

人代会后不久,我被邀去中南海听了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的报告,阐发中共中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精神(以后简称“双百方针”),很令人鼓舞。他在报告中还提到俞平伯的“新红学”论,认为这是对他粗暴的批评,当场表示对俞先生道歉,我听了很受感动。

过了几天,又听到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传达关于刘少奇同志两次对新华社的讲话,讲话的大意是新闻工

作以后不要生硬照搬苏联的经验,报纸应注重消息(新闻),创造中国特点。刘少奇还建议,新华社不妨自己办一张报纸,与《人民日报》比赛。

又过了若干天,邓拓同志果然把《人民日报》实行改版,贯彻中央“双百”方针。“副刊”上也刊载不少以前从未有的新题材,如杂文、喜剧等等。听钦本立同志说,邓拓同志已邀请萧乾同志为副刊顾问,帮助充实文艺作品,并组织作家来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

当时,我家住在东四十条西口,和钦本立同志住的《人民日报》集体宿舍只隔二、三家门面。他常于公

余来我家谈天。原《文汇报》的北京办事处,在灯市口朝阳胡同三号,那时已改名《教师报》城内记者站(《教师报》报馆在北太平庄建有办公大楼、职工宿舍),仍由浦熙修同志(任编委兼新闻部主任)负责。

她有时也来我家,约钦本立(她参加《文汇报》,原由钦向我推荐)一起来交谈对《人民日报》之新改革以及“双百方针”提出后之新面貌,甚为鼓舞。但那时我心如止水,安心于《教师报》工作,绝没想到《文汇报》有朝一日会复刊的事。《教师报》每周出两期,发行五十万份以上,我也很高兴。重要社论,大多由叶圣陶先生执笔,他的文风清丽而晓畅,没有时行的教条气,深得读者的欢迎。我除每周主持两次编前会议外,公余的时间较多,除读书报外,可以在城内及四郊名胜游览,甚觉安适。

大约在6、7月间，忽然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同志前来报社访问（那时北太平庄尚属远郊区，《教师报》四周，还有大片大片的田畴或矮屋）。寒暄后，他向我问道：“你近来心情如何？”我答道：“我情绪甚好，安居乐业。”他哈哈笑道：“你不要说表面的话，你这位老办报的人，在这一家一周出两张的专业性报里泡着，能安得下心吗？”接着他对我说：“现在中央为贯彻长期共存的精神，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请章伯钧任社长，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为中共老同志，中央决定撤出来，想请你担任总编辑，让我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连忙摇头说：“你知道这一台戏是不好唱的，我有我的‘班底’，现在都在《教师报》，单把我一人调去当主角，这台戏怎么能唱？”他听了想大概也有道理，不再

徐 铸 成 著

徐铸成 1949

年9月参加第一
届全国政协

五



谈了,谈了些别的,就告辞而去。后来怎么请出储安平的经历,我就知道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傍晚,我应邀去波兰大使馆参加国庆鸡尾酒会,正和常芝青同志(那时他已调至《大公报》任党委书记)站在一起,我拿了一只冷盘,并随手接过了一杯酒,相互交谈。他不经意(大概以为我已知道了)地说:“中央已决定《文汇报》复刊,想必你已接到通知了。”听我说“没有”,他就不谈下去了。

我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回到家里,立即打电话把钦本立和浦熙修同志约了来,把这一尚待证实的消息告诉他们,大家都高兴。浦二姐在京人头最熟,立即掏出小电话本,打了几个电话,向几位有关方面

的人打听,都说毫无所闻,时已深晚,他们两位就告别回去了。

第二天,恰好当时任《教师报》管理部主任的严宝礼进城来看我,得知这一消息,自然也极兴奋。我们立即同车到办事处,和浦熙修同志商量的结果,主张向“老领导”夏衍同志去打听,打电话到文化部约他在灯市口的萃华楼饭庄便餐,夏衍同志很关心我们,欣然赴约了。

哪里知道,夏衍同志也不知确讯,只说:“听到一些有关《文汇报》的消息,也未能证实,我昨天和小姚(姚溱同志)通电话,他也不清楚,看来中央还未完全决定,你们静静候着吧。”

第二天浦熙修忽然想起,说她有陆定一同志办公室的专用电话,不妨试试,直接问问他(她和陆定一同志在重庆时期即有工作联系)。

陆定一同志回答:“这事中央已有决定,但我主要抓文化思想工作,关于新闻工作,主要由副部长张际春同志管,等时机成熟,他会打电话通知你们,你们安心等着吧。”

这样,一块石头落了地。



徐 铸 成 著

徐铸成 1951 年作为中国人民第一次赴朝慰问团成员，摄于朝鲜平壤南部某地。

七

没有几天，张际春同志的电话果然来了，约我和浦熙修二人翌晨九时在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面谈。

翌晨，我们同到中南海，张际春副部长立即出来会见，在座的还有中宣部新闻局长王同志（这位同志以前曾屡次在新闻界聚谈中见过多次，曾在解放之初任山东《大众日报》总编，可惜，一时记不起他的尊姓大名了），没有别人。张际春同志对我们说：“中央已决定《文汇报》复刊，所以请你们两位来，作为正式的通知。希望你们尽快写好两个方案：一、《文汇报》复刊后的编辑方针；二、《文汇报》复刊计划，包括房屋、机器设备和职员搬迁，以及复刊时要多少资金等，希望开列清楚。中央盼《文汇报》早日复刊，因此希望你们抓紧，送给我们，转呈中央审批。”他还问我们有什么具体要求？我说：“《文汇报》解放前有不少得力的编辑干部，现分散在各机关，我希望中宣部能帮助我们争取一部分人回来；因为办报好像一个戏班，单靠主角是唱不好戏的。第二，《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钦本立同志是和我合作有年的同志，是否请《人民

日报》支持,让还给《文汇报》?”张际春同志说:“第一点,你们可开列一名单,我们将尽力向有关单位争取。第二点,钦本立的问题,必需《人民日报》邓拓同志肯放,我们决定告诉他,你们是朋友,不妨先和邓拓同志商量。”接着,他拿出一封信,对我说:“你说要过去班子的人归队,我想起前几天有人投书给中宣部,说他原在《文汇报》,现在进出口公司工作,用非所学,要求归队。我们正想办法安排,你们就把他带回去吧。”

回到办事处,严宝礼兄已在等着,我们简单谈了经过,请他准备写一份复刊计划草案,他认为这事好办,找几位管理部的科长谈谈,可以如期写出。

徐铸成 1957 年
(时年五十岁)赴苏访问,在塔林机场发表讲话时摄。

八 亲 历 一 九 五 七



编辑方针怎么写,我很踌躇,当晚,把钦本立、浦熙修同志请来,一起商量。大家认为,中央如此英明地决定“文汇报”复刊,大概认为《文汇报》与知识分子一向有联系,应以宣传双百方针为重点。但如何宣传,我心中无底,钦、浦两位也提不出具体意见,所以陆续谈了两天,我还难以落笔。

正在我为难之际,钦本立来对我说:“邓拓同志对《文汇报》非常关心,如果你愿意,是否与邓拓同志约期谈谈?”自从一九四九年新政协会议以来,我对邓拓同志的品格、态度,就特别感到钦佩,加上前面提到的,

徐 铸 成 著

他对《文汇报》评价相当高,所以极愿向他讨教,当即请钦本立同志约好日期、地点,我决定登门拜访。

第二天,本立就来说:“邓拓同志很高兴跟你和浦熙修同志畅谈,明天晚上他已决定不去上班,特地留出充分时间在王府井金鱼胡同《人民日报》他的住宅里,接待你们两位。”

我们准时找到邓拓家中,邓拓同志满面热情地接待我们。在客厅前落座后,我简单地谈及《文汇报》复刊的打算,谈起编辑方针,我说只有一点抽象的想法,主要是宣传中央的双百方针,至于如何具体地一条条写出来,我思想上还不成熟。

邓拓同志对我像极熟的老朋友一样,立即滔滔不绝地谈了几点他的看法:

我们《人民日报》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取得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首先要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使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还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的编辑方针。

其次,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自己封闭多年,你们应多介绍各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

大知识分子的眼界,以利于他们研究、提高水平。

也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外环境应如何合理布置?业余生活知识分子喜欢种花养鸟等等,你们也不妨辟一个副刊,给知识分子介绍一些知识,谈谈这些问题。

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知识分子。毛主席讲过:三大改造完成后,不可避免地在广大农村会出现文化高潮,过去《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部分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我一向反对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说;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说好的,不谈问题。你们不妨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